斯宾诺莎对阿尔都塞理论探索的影响及其当代效应

王雨辰 张星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 阿尔都塞通过“后退”和“绕道”至斯宾诺莎进而厘清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总问题”之本质区别。可以说,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对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的理论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实体一元论”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命题埋下了理论伏笔;“实体自因说”为他提出“矛盾的多元决定论”给予了启示意义;知识分类理论为他阐发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认识论的断裂”提供了理论参照。而其在“实体论”基础上提出的“身心同一论”,因强调身体的感性力量而促使阿尔都塞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进潜能,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也在对斯宾诺莎的重构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转向。因此,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理论回溯,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阐释路径,而且进一步发掘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 斯宾诺莎;实体;身心同一论;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B 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5-0037-09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不仅指出同马克思不断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的整个中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①,而且指出他们的共同点是追寻马克思的思想渊源,阿尔都塞则把马克思的理论先祖归结到斯宾诺莎身上,他断言斯宾诺莎是“哲学史上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并且是“马克思的唯一祖先”②,并认为斯宾诺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导,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将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他的这一观点使得法国左翼理论思想家将马克思哲学渊源回溯至斯宾诺莎,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潮。科学揭示阿尔都塞理论中的斯宾诺莎因素,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阿尔都塞理论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特征,而且有利于克服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而相对忽视斯宾诺莎思想对马克思影响的缺陷。本文立足于阿尔都塞的理论文本,通过揭示阿尔都塞理论中的斯宾诺莎因素,从而更为全面地把握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断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理论命题的含义,并揭示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通过对斯宾诺莎的“重构”所发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民主潜能。

一、“后退”和“绕弯”:从斯宾诺莎经由黑格尔回到马克思

阿尔都塞在《自我批判材料》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在我第一批作品(《保卫马克思》《解读〈资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7AKS017)和中宣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宣办发[2015]49 号)阶段性成果。

①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恬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5 页。
②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 页。

本论〉》)里头的基本的理论主义(=思辨理性主义)的倾向”①,甚至还公开宣称自己和巴里巴尔、马歇雷都曾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就此而言,阿尔都塞是从斯宾诺莎哲学“走进”和“保卫”马克思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深度耕犁,而采取“后退”和“绕弯”的方式对由笛卡尔开创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后继者斯宾诺莎却情有独钟,又是如何以斯宾诺莎为“契机”另辟蹊径确立了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首要问题。

“后退”和“绕弯”作为阿尔都塞特有的认知图式,是指认识要想获得真理的形式就必须先从别的哲学“后退一步”或“兜个圈子”,从而在区别和差异中不断地划清界限、厘定立场。阿尔都塞早在其 1948 年完成的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中就谈到这种认知方法的必要性——“认识为了要在真理中占有那种躲避其自身的确性的东西,就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绕弯的过程”②。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重新退回”说,即马克思一方面从虚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退回,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重新退回到现实的起点,接触到真实事物本身和真实的历史。这就意味着,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回到起点,以便接触事物本身和真实历史,并正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浓雾中若隐若现的那些存在。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思想解放的历史就不能被理解;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没有向真实历史的这一退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倒退),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仍然是个谜”。③ 后来他在 1964 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论战性文章《弗洛伊德和拉康》中试图阐释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科学性及其现实意义,为此再次强调了“仰赖于取道其他科学兜一个圈子的手段”④对于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在 1975 年《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当时就开始利用 18 世纪作家来兜理论的圈子,在我们看来,这个过程不仅对于理解哲学,而且对于哲学本身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⑤在不同时期的论著中,阿尔都塞不厌其烦地反复申明“后退”和“绕弯”的方法,不仅表明了他想要突破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包围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企图,而且也意味着“兜圈子”的理论冒险绝不是他思维方式中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理论策略。

之所以如此则主要取决于哲学工作本身的内在诉求,无论是将哲学界定为“理论实践的理论”还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哲学要获得自身存在的前提通常是以理论场域中的预防性攻击为方式实现的——笛卡尔反对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尔、黑格尔反对康德、德里达既保卫又反对海德格尔,哲学利用取道其他哲学“后退一步”或“兜一个圈子”而与之拉开距离并占据一定的理论和政治空间。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任何哲学都不以绝对存在的简单形式而表现自己(不论它自己如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它从不认为能以其绝对存在的简单形式而表现自己);任何理论都是在竞争中与分裂中彰显自身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努力找出它同其他哲学的差异,而其他哲学则通过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邻性或相异性,使它能够感觉、看到和抓住自己同它们的差

①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版,第 146 页。
② 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3 页。
③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57 页。
④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版,第 224 页。
⑤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第 196 页。

异,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立场”①。这种通过比较差异的划界过程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路径——回溯到斯宾诺莎以发掘马克思与黑格尔“划清界限”的场合,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以回到马克思对阿尔都塞来说是一种理论的必然。他不是用马克思来理解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的谜语一般的文章以及在对这些文章的并不高明的评论面前”寻找正确“解读”马克思的突破口却绝非易事②;他也不是用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因为自卢卡奇以来的人本主义阐释路径就是在黑格尔那里“绕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空场”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般的意识形态”的窠臼,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与反思不是立足于社会现实而是斯大林个人的品格所展开的事实便是最好的例证;在他看来,只有用斯宾诺莎来破除黑格尔观念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因为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唯心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这显然是为了认识一个绕弯而绕的弯,其直接目的就是“比较清楚地理解从绝对唯心主义的《大逻辑》‘最富思辨的’那些篇章里借来的(是靠‘扳正’和‘破除神秘性质’有条件地借来的,这点也必须加以理解)辩证法,怎么能够而且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是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③。

为什么从斯宾诺莎所作的理论迂回就能在源头上厘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德国思辨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 17 世纪的唯物论者霍布斯、伽桑狄等,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论特质使阿尔都塞对其始终怀有“特别强烈的感情”而甘愿冒着被扣上“结构主义”帽子的理论风险。斯宾诺莎为了突破中世纪经院哲学旧思想体系和克服笛卡尔哲学的二元论困境,他以存在(神或自然)为本体论基础,企图通过知神和认识自然以完善人自身的知性或理性这一途径,最终达到人的最高幸福和自由。质言之,客观性、内在性、整体性等多元特征构成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理性主义风貌,使其成为阿尔都塞清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黑格尔因素的关键环节。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费尔巴哈通过主谓颠倒而对宗教异化展开无情的批判以建构起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体系,但这种以“感性确定性”通达世界的方式却始终无法走出抽象王国的领地;与他截然不同的是,斯宾诺莎把“神”“自然”或“实体”看作万事万物的根源,主张以结构性因果关系而不是线性因果关系来解释世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赞扬斯宾诺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和科学”④。黑格尔则是以“绝对精神”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主张世界就是不断地对象化又克服这种对象化而回归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以“虚无的存在为开端”批判主观性的同时“不仅保留了主体在‘实体向主体演变’中的地位,而且保留了主体在无主体过程的目的内在性中的地位,从而是无主体过程通过否定的否定,实现观念的意图和命运”⑤;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一样都否定了起源论和先验论,但他以泛神论为表征方式的唯物主义哲学给予“神”以绝对性、无限性和整体性的本质特性,因而斯宾诺莎语境中的“物”不是黑格尔思辨意义上的“绝对精神”之外化,而是作为整体的内在之“物”,由此破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和观念论。

总的来说,阿尔都塞基于对哲学的界定而采取“后退”和“绕弯”的认知图式实现了理论和现实的革命,斯宾诺莎哲学因强调客观性而贬抑主观性、重视整体性而反对局部性、突出内在性而弱化外在性的理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为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了方向,即通过从斯宾诺莎那里兜的第一个圈子(即世界以上帝为开端),正确地看清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差

①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第 151 页。
②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241 页。
③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第 15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6 页。
⑤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245 页。

异,阿尔都塞因而得出“矛盾的多元决定论”的论断以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通过从斯宾诺莎那里兜的第二个圈子(即理论拒绝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幻象),阿尔都塞通过阐明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认识论的断裂”以批判“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通过从斯宾诺莎那里兜的第三个圈子(即真理既指出其自身又指出谬误),阿尔都塞导出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的无主体过程,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命题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二、“实体学说”:阿尔都塞重塑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的“契机”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日渐兴盛之时,阿尔都塞立足于科学主义立场,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本主义阐释路径,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使马克思倒退到在他之前的、产生于 18 世纪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去,从而抹杀他在理论上实行革命决裂的独特功绩”①,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因此,阿尔都塞的理论主题是既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自主性,又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这就要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宾诺莎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他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绕不过去的理论家。

斯宾诺莎理论的特殊性在于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实体一元论”,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实体一元论”能够成为重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实体”作为标识一切存在的最高统一者的哲学范畴是由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首次提出,他的“综合实体”学说(即物质实体、精神实体、“纯形式”实体)在后世的哲学家那里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并由此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主旨。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怀疑论的方法推出了自我实体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推出“上帝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存在,强调“自我实体”和“物质实体”作为各自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具有不可通约性,但二者又在“上帝”或“神”这一更高实体那里实现了统一。笛卡尔在继承亚里士多德“三实体”思想的同时而又具有二元论的理论倾向。斯宾诺莎则通过“神即自然”的命题表明了其实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神是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实体,而思想和广延的东西不是笛卡尔意义上分属于两个实体的两种属性,而是隶属于神这一实体的两种不同属性。黑格尔一方面对斯宾诺莎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这是一切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②;另一方面又毫不留情地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脱离一切特殊样态、无任何规定性的抽象范畴,以“实体即主体”的观点来改造其缺乏个体性、精神性、能动性的实体,世界万物都是“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通过自我反思和扬弃而不断外化之结果。不可否认的是,斯宾诺莎以“神”为核心范畴的泛神论唯物主义不仅调和了二元论的内在矛盾,而且还有力地驳斥了伪装在形形色色意识形态之下的先验论和目的论,因此,作为规定着斯宾诺莎哲学性质的实体论也就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阿尔都塞建构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经之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为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命题注入了思想活力。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在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意识形态”决裂中实现“认识论的断裂”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其特殊差异理应不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简单相加为理论材料,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能延续传统哲学的“总问题”而缺乏批判性与革命性。为了真正把握马克

①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 160 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0—101 页。

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确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特质,阿尔都塞取道斯宾诺莎发现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整体辩证法”存在本质差别。在他看来,尽管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一样都认为世界既没有开端又没有起源,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世界是在“绝对精神”外化又回归自我的过程中生成,自然、社会和人无一不是对“绝对精神”合理性的确证——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哲学,这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论的神秘主义色彩。“对斯宾诺莎来说,开端是上帝,不过目的是要在上帝唯一无限的权力中否定作为存在物(大的主体)的上帝。因此像黑格尔一样,斯宾诺莎抛弃每一种起源、先验或不可知的世界的论点,甚至在本质绝对的内在性里伪装起来”①。但是斯宾诺莎的“神”是不具有反思性和任何目的性的绝对实体,因而表明了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统一性,而且自然万物的根本原因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内,不存在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任何实体。斯宾诺莎的实体论“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客观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先验主观主义”②,阿尔都塞由此揭开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面纱——通过否定之否定将事物交由思想,同时斯宾诺莎这种坚持客观性而贬抑主体性的基本哲学立场也渗透到阿尔都塞的社会历史观之中。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因为个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受制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而非人性或人类主体的意识,马克思就是基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才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此而言,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而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的本质,从自由的人这个主体,从需求、劳动和愿望的主体,从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出发,企图从理论上来解释社会和历史。……马克思只是在与这类人道主义观的理论企图决裂的条件下,才创立了历史的科学和撰写了《资本论》”③。所以,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通过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回溯不仅解放了捆绑在黑格尔辩证法上的马克思,而且也为他提出反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命题埋下了伏笔。

第二,斯宾诺莎的“实体自因说”为阿尔都塞提出“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提供了启示作用。在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实体论中,实体是单数意义上的完满性存在,因而是作为整体、原因和本质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和无限性,样态是作为部分、作为结果和作为现象表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有限性。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处在一个相互作用、普遍联系、互为因果的整体之中,实体乃是其自身的原因,即是说,“神是一个固有因而不是一个超越因,因为神是在其自身之中而不是在其自身之外产生一切,因为在它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④。正是凭借“自因”概念,斯宾诺莎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验性存在(如上帝实体)清扫出唯物主义的大门,也一并批驳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观”和以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表现性因果观”——前者描绘的是一个因素可以推论出并且决定另一个因素,只考虑部分对部分的关系;后者是以整体在本质上决定部分为预设前提,而部分只不过是整体的直接表现。阿尔都塞据此认为,“斯宾诺莎思考了一种不仅是可转移的(笛卡尔式的),而且是没有外部表现的(莱布尼茨式的),非先验性的因果关系,一种阐明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的因果联系(这个毫无边际的整体仅仅是其各部分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⑤。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表明一种多元决定的历史观,可简要地表述为:经济状况表现为“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表现为“反作用”。所以说,“实体自因说”蕴涵的结

①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第153页。
② 参见金·W·霍兰德:《斯宾诺莎与马克思》,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5),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
③ 沈恒炎、燕宏远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
④ 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洪汉鼎、孙祖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9页。
⑤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49页。

构性因果观的理论指向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某种相似性,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把马克思关于“归根到底经济起决定作用”的论点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式的“一元决定”历史观,因为“如果整体被看作结构,也就是被看做具有完全不同于精神整体的统一类型,那么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不仅不能用分析的和传递的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结构对于各个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且也不能用现象所固有的内在本质的普遍表现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这种决定作用。……斯宾诺莎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解决,他是唯一具有这种空前勇气的理论家,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使他隐没在黑暗之中,我们只是通过马克思(然而他对斯宾诺莎并不了解)才隐约看出他的真实面目”①。既然社会总体是由主导性矛盾支配下的多种矛盾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整体,那么任何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简化为或还原为某种经济因素、绝对理念亦或是人的本性之企图都必然是徒劳的。加之受到拉康等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差异性等观点的影响,阿尔都塞在晚年从“多元决定”的概念出发走向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开端于伊壁鸠鲁,经由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霍布斯、卢梭等人的继承,在马克思那里发展到最高峰,甚至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②

第三,斯宾诺莎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为阿尔都塞阐发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认识论的断裂”提供了理论参照。存在、认识、自由构成了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三个重要环节,知识则是人作为“在他物内”的样态状态过渡到作为“在自身内”的实体状态的唯一手段,而在人向神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阶段——“想象”或“意见”、“理性”、“直观知识”,其中理性和直观知识被统称为具有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真观念”。所不同的是,第三种知识(即直观知识)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认识事物”的绝对必然性,“我们的一切行为唯以神的意志为依归,我们愈益知神,我们的行为愈益完善,那么我们参与的神性也愈多”③,由此斯宾诺莎赋予第三种知识以最高的伦理价值。马克思的认识论不能直接还原为斯宾诺莎的三类知识,因为马克思是从认识活动的逻辑序列出发划分了直观、表象与思想具体不同阶段,在斯宾诺莎看来作为最完善知识的“直观知识”却被马克思贬斥为简单的、非反思性的经验范畴。阿尔都塞事实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直观和表象是被马克思作为抽象看待的。而我赋予这种抽象以具体或经验的地位,你可以发现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第一等级的知识——用我的话说,也就是赋予它以意识形态的地位”④。但是,他仍然试图借助斯宾诺莎的认识论认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差异,于是就在此展开了一种“合理的”理论想象,把马克思的理论置于斯宾诺莎的知识论批判之中,并将斯宾诺莎的三分知识样式压缩成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分,即:斯宾诺莎的想象(或意见、直观)指向“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而理性认识则指向“科学的理论实践”。关于前者,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与科学认识无关的“虚假意识”和表象体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因为他在《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中揭示了意识形态具有的三种性质,它们分别是:“(1)它的虚构的‘现实’;(2)它内在的颠倒;(3)它的‘核心’:关于主体的幻想。可以说,它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抽象理论”⑤。斯宾诺莎关于“意识形态与主观臆想等同”的观点被阿尔都塞进一步发挥为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存在“认识论的断裂”的理论主张,因而破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幻象——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关于后者,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话语都是源于斯宾诺莎的“真观念”,“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具有真观念,所

①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 171 页。
② 参见王雨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5—91 页。
③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93 页。
④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1 页。
⑤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第 153 页。

以我们才能依照它的规范生产出别的观念来。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具有真观念,所以才能知道它是真观念,因为它是‘index sui’[自明的]”①。由此,阿尔都塞以斯宾诺莎的知识分类为理论参照系而形成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方法论,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阐释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分期及其实现哲学革命的关键在于“认识论的断裂”,从而驳斥了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等同起来的观点。

三、“身心同一论”:从阿尔都塞走向激进政治的重要环节

直至 19 世纪中后期的尼采宣称“一切从身体出发”才使身体及其本能从主体哲学的深渊中被解救出来,而哲学的“身体转向”在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中早已初现端倪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都塞亦不例外。所以他在其自传《来日方长》中这样写道:“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而心灵(被错误地翻译为灵魂和精神)是指观念,它自身被这个术语错误地表达。虽然我们忽视了太多的身体潜能,斯宾诺莎认为,身体作为一种潜能,其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件对世界开放的、公正的礼物……正是斯宾诺莎在一个例子中惊人地认为:恐惧就是希望……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是唇齿之间关系。”②

事实上,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是其实体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因为实体是唯一的,心灵和身体的关系实则是作为唯一实体的两个属性(即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之普遍关系的特殊表现。正是基于观念和对象表现了思想样态和广延样态的同一,他把“心灵”和“身体”分别界定为人的身体的观念、人的心灵的对象,二者属于同一实体的不同方面,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决定和影响。归纳起来,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③:一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是不同类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因而不能发生任何影响或交感作用;二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作为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的变化必然同时伴有另一方与之对应的变化,因而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三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既然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它们的因果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彼此相互配合、一一对应,表现了一种同一关系。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显然是一种“身心同一论”而不是“身心平行论”④,以“对神的理智的爱”达到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之内在统一,由此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不仅实现了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向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转变,而且还削弱了自柏拉图以降关于灵魂、意识或理念之于身(肉)体的优先性地位,从而为身体挣脱灵魂或意识长久以来的压榨与束缚预留了理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进潜能和现实可能。

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身体”虽然在他讨论意识形态与主体关系问题的时候只是被“简单地提了一下”,但由于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强调身体的“潜能”和“力量”之于抽象灵魂的反叛,所以从他那里迂回而建构起的理论蕴含着当代激进政治的理论向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归结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有关论述可知,如果离开了人的具体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个体生命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而身体作为实践主体的物质载体就必然要求“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

---

①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 198 页。

②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7 页。

③ 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3 页。

④ 该观点最初是由英国学者 F. 帕罗克(Pollock)以及德国学者文德尔班根据《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七及其附释提出的,他们认为,精神的事件和肉体的事件彼此是独立地发生的,因而这两个系列是相互平行的关系。与之相对的观点是“身心同一论”,以英国的 A. 沃尔夫(Wolf)和德国的雅斯贝尔斯为代表,他们主张心灵和身体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

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阿尔都塞在承袭马克思、恩格斯以“感性活动”为出发点理解身体的基础上,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进一步指出个人是在不断的意识形态的询唤或呼叫中被“构建”的主体,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军队、法庭、宗教、学校等国家机器对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的技能、伦理等进行规训——“政治的机器使个人臣服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文化的机器也是一样的(体育的沙文主义作用最为重要);宗教的机器则在布道和其他人生重大典礼中融汇意识形态;家庭机器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灌输意识形态”②。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学校教育占据这着统治地位,并且使这种被调教、驯服、规范的身体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再生产的工具,不仅如此,当代资本主义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对人的肉体乃至灵魂进行全面的盘剥和压榨,因为以镇压性国家机器对肉体的监控、惩罚和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灵魂(思维)的塑造、赋形总是交织在一起,甚至是借助于现代政治技术在更深层次上对人及其身体的历史记忆进行有意地裁剪和消解,“如果我们严格地理解阿尔都塞的‘我们用身体思考’,那么我们将不再把暴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理解为外在和内在的区别、作用在身体上和作用在心灵上之间的区别。相反,我们被迫接受强力和同意的‘同体性’,即并没有单纯的对心灵的说理,除非这种说理被界定为它是内在于强力的,无论这种强力是强是弱,这里提到的强力或者是使我们遭受痛苦、灾难或死亡,或者是不为人们所知的物理的、控制着身体或空间,但并不带来痛苦与伤害”③。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拒绝主体哲学思维范式下将肉体和灵魂割裂的做法,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斯宾诺莎“身心一元论”的潜在影响:一是基于对身体及其内在性的重视而发现由意识形态中介了的主体是从对肉体的控制开始的;二是鉴于身体与灵魂、思想、意识的同一性关系而彻底揭露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施行的全面而深层的控制与剥削。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直接承载着社会生产关系的身体,在对劳动力的身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折射着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样态,因此,对于身体、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成为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而斯宾诺莎“第一哲学”这种严格的“总体性”和“统一性”使其从同时代人的哲学基地中摆脱出来,并在阿尔都塞启发下的斯宾诺莎也由此成为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重构”其政治理想的重要理论资源。譬如说,奈格里认为,既然身体在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中已经摆脱了心灵或意识的束缚,那么身体的无限性在扩展的过程中必然赋予每个人以多样性并由此生成具有差异性的“多众”(multitude),为了自我保存和再生产而需要将个体欲望政治化以激活反抗的力量,因为“存在表现为综合性的身体之巨大的肉体性的行动,以及身体的多样性。‘存在’就意味着参与多样性”④。作为阿尔都塞学生的巴里巴尔,也沿着这一思路在斯宾诺莎政治哲学中寻求介入当代政治的新路径。在他看来,“国家”与“实体”一样也存在着广延和思想两个样式层面——前者是一定数量的个人的物质力量组合所形成的更强大的整体,后者是同样那些个人为了摆脱希望和恐惧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②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 345 页。

③ Warren Montag. 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 Althusser and Foucault, 1970-1975. Yale French Studies, No.88, 1995: 69.

④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contemporary variations.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消极情感而达成的共同观念。① 而个体在理性的指导下挣脱消极的激情或想象的控制而获得行动的自由,但要使自由生活的实现不是偶然事件就必须诉诸国家,因为国家状态的建立本就是为了克服共同的恐惧、消除共同的不幸。正是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交往性"结构中,众多个体的物质活动、心灵活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并推动着国家组织成为融和了安全目的和自由目的之内在张力的社会本身。由此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并以此为理论参照系而将潜存的黑格尔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剥离出来以免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染,这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而且为当代激进政治关于霸权理论、空间辩证法以及事件政治等理论开辟了道路。

作为"反传统"思想家的阿尔都塞为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以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唯物主义理论为"普照之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路径——通过在斯宾诺莎那里"兜圈子"来反对黑格尔观念论、目的论以及本质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弱化,他一方面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论式的理解,另一方面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阿尔都塞的追随者透过斯宾诺莎所磨制的"棱镜"从不同角度看到了当代激进政治的潜在可能性及其现实路径。可以说,阿尔都塞及其哲学给后世留下了相当丰厚的理论遗产,所以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讲话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的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②。

Spinoza's Influence on Althusse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ffect

Wang Yuchen, Zhang Xing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Althusser (阿尔都塞) clarifie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Hegel's and Marx's "general problem of theory"(理论总问题) through "going backward" and "making a detour" to Spinoza (斯宾诺莎). It could be said that Spinoza's "entity theory"(实体学说) produc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thusse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reshaping the scientific form of Marxism. And this wa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his theory of entity monism (实体一元论) laid a theoretical foreshadowing for his proposition that "Marxism is theoretical anti-humanism"; his theory of entity self-sufficiency (实体自因论) gave enlightenment to his "pluralistic determinism of contradiction"; and his theory of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provide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him to explain the "epistemological break"(认识论的断裂) between science and ideology. On the basis of his "entity theory", Spinoza put forward his "body-mind identity theory"(身心同一论).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this theory emphasized the emotional power of body that Althusser rediscovered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radical left-wing thinkers also took a political turn for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inoza. Therefore, Althusser's theoretical backtracking of Spinoza not only established a path to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also further explored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Baruch de Spinoza (斯宾诺莎), entity, body-mind identity theory (身心同一论), Western scientific Marxism (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 politic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艾蒂安·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4—245 页。

②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 510 页。